

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演变探析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汪弋茗

(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 文章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首先阐述了产教融合相关概念, 然后说明了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历史制度主义, 接着分析了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演变历程, 最后论述了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演变逻辑。

关键词: 职业教育; 产教融合政策; 历史制度主义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6401(2022)13-0037-05

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2月, 国务院出台《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强调“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双元’育人”^[1]。同年6月, 教育部出台《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 强调要“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2]。从国家短期内连续出台两项政策可以看出其对产教融合的重视程度, 同时可以看出产教融合对职业教育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 各方应当把握政策演变脉络, 为我国职业教育进步发展做出贡献。基于此, 本文拟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对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演变加以探析。

一、产教融合相关概念

手工作坊式生产模式是人类经历的第一种生产模式, 在这种生产模式中, 师傅和徒弟在生产中教学, 在教学中生产, 这种模式使得“产”与“教”融为一体, 又被称为学徒制。但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 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 使得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 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也急速上升, 这时候能够大量培养专业型人才的职业教育也就应运而生。与学徒制相比, 职业教育的优点十分明显, 即能够大量且稳定地培养社会需要的“专才”, 解决生产力发展导致的人才短缺问题。但同时其缺点也十分明显, 职业教育的学生需要在学校完成学业才能在工厂里从事生产活动, 这就导致职业教育中“产”与“教”是分离的。“产”与“教”的割裂会导致职业教育办学质量难以提升, 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方式就是找出“产”“教”分离的深层次原因, 使“产”“教”重新融合在一起。

现阶段, 对“产”与“教”的理解不能仅局限于“生产”与“教学”, 应当拓展为“教育制度和产业制度相融合的职业教育的国家基本制度”。笔者认为, 产教融合应定义为: 一种学校、企业、政府等多方参与, 以满足社会专业型人才需求为目标的社会组织形式。本文中所指的产教融合政策就是指由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性文件。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历史制度主义

许多学者使用不同的理论来研究我国教育政策与制度, 其中使用最多的就是结构主义理论。结构主义理论的基础理论比较简单, 它认为任何制度背后都存在一种“制度的深层结构”, 而这种深层结构会影响制度的形成与演进方向。在结构主义理论中存在两种研究路径: 第一种研究路径认为“制度的深层结构”是由社会的政治经济所决定的; 第二种研究路径则认为“制度的深层结构”是由社会文化所决定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则构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第一种研究路径是从社会的宏观经济政治背景来解读我国高校政策与制度的演进变化。例如, 古光莆等^[3]认为“我国职业教育是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产生的, 尽管其演绎和外延的层次及表述不同, 但其职业教育内涵和发展本质是一致的”。秦芬^[4]认为“产教融合政策涉及经济与教育、企业与学校等多个不同领域, 需要跨界的管理与运行的外部环境的支持及相关职能部门高度紧密的合作”。第二种研究路径则认为应当从社会的文化信念或文化心理倾向来解释制度的形成机制和演变方向。例如, 李玉珠^[5]认为“文化环境指与产教融合相关的认知、情感、价值观的集合, 其影响着产教融合发展的理念与范式, 从而影响产教融合政策的制定与实践行为”。结构主义理论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产教融合政策的演变问题, 但是它在面对“制度的深层结构”没有显著改变的情况下, 产教融合政策仍然发生演变的问题时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历史制度主义是在对结构主义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主要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寻找制度演变背后的宏观因素, 也就是造成制度演变的深层次原因。第二部分是在普遍存在的基本因素与我们看到的特殊的制度现象之间, 通过关注其中的行动者来建立逻辑联系。由此可知, 从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出发进行探析, 可以帮助相关教育者把握政策演变脉络、看清制度演进过程。

DOI: 10.16681/j.cnki.wcqe.202213011

作者简介: 汪弋茗(1994—), 男, 汉族, 江苏淮安人,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教育经济与管理。

注: 本文系江苏省2020年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高校教育扶贫路径研究”(编号: KYCX20_2101)。

历史制度主义是通过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对制度演变因素进行分析,其分析框架主要有三个关键步骤。首先,对造成制度演变的宏观环境进行解析,主要是对经济制度、风俗文化、政治制度等宏观环境的变化对制度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目的是通过对制度变迁背后存在的基础因素进行分析,说明制度变迁的现象。其次,分析政策的路径依赖。分析政策的路径依赖即分析政策走过的路。路径依赖是指过去执行的政策文件会对当前制度下颁布的政策执行产生一定的影响,其认为随着已有政策的不断执行,当前执政者改变该政策所付出的成本比继续执行该政策得到的利益要多。产生路径依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报酬递增,即当一个政策正式形成后,其自身会不断强化。政策的形成是由多方利益集体共同决定的,当一个政策落地后,政策行为者为了避免执行新政策可能会带来的资源浪费及潜在风险大多会选择维持现行政策。同时,政策执行者因为公共的利益需求,会结合在一起以保证政策得以执行,这就形成了政策网络。政策网络的出现使得执行新政策、废除旧政策的成本与难度大大增加。第二,相较于政策的执行时间,政策执行者在职的时间相对短暂,所以政策执行者大多会选择见效期短的政策,同时也会在废除政策的法律程序上设立障碍,这点也增加了政策变更的成本,加剧了路径依赖。最后,对动力机制进行分析。这是从微观层面出发揭示制度演变的内在动力。研究历史制度主义的学者认为影响制度演变的决定性因素是否决者的态度与否决点的分布。否决者就是政策相关的组织、政党领袖、利益群体等,他们的态度可以决定新政策是否被接受,否决者又可以被分为制度型否决者、团体否决者、党派型否决者、个体否决者等多种类型。否决点可以理解为否决者在政策生成的过程中用于改变或停止该政策的途径。否决点的使用是由当地的政治制度、国家最高法律、政党体制共同决定的。也就是说,当否决点少时,政府有极大权力决定某项政策是否能被采纳,相反的,若是否定点较多,那么其他利益团体就可以通过否决点干涉该政策是否能被采纳或执行。

通过对历史制度主义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历史制度主义同样适合于对政策变迁的研究。所以,本文就以历史制度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对造成我国职业教育中产教融合政策变迁的内在因素进行分析。

三、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演变历程

根据历史制度主义的观点,对历史进行分阶段研究的重点是要找到历史的“变点”,明确每段历史的发展特性。由此,本文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产教融合政策划分为五个阶段。

(一)政策萌芽阶段(1949—196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各行各业包括教育行

业都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各行各业都急需人才,所以这一时期的教育是为国家建设发展服务。为了培养符合国家发展的人才,国家对教育系统进行了改头换面的调整,将国民政府执政期间执行的教育模式改变为当时苏联政府执行的专才培养模式。1949年,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提出“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基本原则,奠定了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的基础^[6]。1952年,中央颁布《关于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的指示》的文件,对社会各组织提出要求,强调注重产业与教育的结合,加强共同育人的责任履行^[7]。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要支持行业企业、大型厂矿等单位积极与职业院校合作办学,积极探索产业发展与教育相互融合的创新教育模式^[8]。概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十年是我国职业教育探索产教合作的萌芽期。

(二)政策恢复阶段(1978—1990年)

1978年12月,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改革开放的历史序幕在中国徐徐展开。现代化的建设需要时间、需要物资,更需要人才。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但由于这一时期的青年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教育,也就导致其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这时摆在国家面前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培养适合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才,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国家出台了有关政策。1979年,《国家劳动总局技工学校工作条例(试行)》(现已被《技工学校工作条例》代替)提出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应当与社会发展所需的生产劳动者相匹配,提高学生在实践中的动手能力。同时,明确指出技工学校的教学应当与生产结合起来,并通过两者的结合来提升学生动手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并要求各地的劳务总局做好对接工作,各地企业也要配合学校培养工作^[9]。该文件明确体现了国家对产教融合的重视程度,突显了“产”“教”不可分割的关系。

198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根据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要求,高中毕业生一部分升入普通大学,一部分接受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要提倡各单位和部门自办、联办或与教育部门合办各种职业技术学校”,这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一词第一次出现在国家政策中^[10]。1989年发布的《关于技工学校深化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技术学校要“深入实施院校专业教育和社会生产实际相结合,加强对学生的专业基础基本知识及专业技能方面的培养”^[11]。总体看来,这一时期国家政策的出台帮助了学校、企业合作发展,在当时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建设者,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框架在这个时期也已经初具模型。

(三)政策巩固发展阶段(1991—1996年)

1991年发布的《关于加强普通高等专科学校教育工作的

意见》不仅认识到产教融合的重要性,还意识到职业教育的发展应当是与产业、企业、社会挂钩的,只有通过激发社会各方面动力,才能实现职业教育的目标^[12]。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颁布,支持职业教育与社会其他主体联合办学的决定,并通过法律形式奠定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地位^[13]。该法律的颁布,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正式进入规范发展的阶段,为实现产教融合的深度发展确立了法律依据。

(四)政策创新发展阶段(1997—2010年)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社会的进步发展,各行各业对人才的需求更加强烈。于是,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颁布实施的基础上,陆续颁布多项政策,以促进产教融合的多形态、创新性发展。这段时间,政府主要从三个方面对产教融合政策作出调整。

第一,加强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师法》明确提出要加强职业教师队伍建设。2000年,《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也提到各地区各校应当加强对“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14]。不难看出,此政策对职业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给予了更细致的指导,同时也赋予了更多的政策保障。

第二,改变社会背景,引导多元参与。2002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提到需要在全社会弘扬“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风气^[15]。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十一五’期间,继续完善‘政府主导、依靠企业、充分发挥行业作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办与民办共同发展’的多元办学格局和‘在国务院领导下,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管理体制”^[16]。

第三,开辟“产学研”合作新型路径。1998年,教育部颁布《面向二十一世纪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原则意见》,明确提出产教结合,要求强化职业教育与行业企业的联系,从地区与行业的需求出发设置合理专业与教学^[17]。

总的来看,这段时期内有关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政策发布较多,内容也较丰富,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总体框架基本形成。

(五)政策深度发展阶段(2011年至今)

事实上,上个时间段结束时就已经明确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发展的方向、内容、目标等,这个时间段主要是对已形成的框架进行加深、巩固,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突出企业主体地位。2015年,《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动教育教学改革与产业转型升级衔接配套,加强行业指导、评价和服务,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推进行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

全过程,实现校企协同育人。”^[18]第二,推进“双师型”教师建设。《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和实训基地建设,提升职业教育基础能力”^[19]。第三,推进职教集团办学模式发展。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指出:“鼓励中央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牵头组建职业教育集团。探索组建覆盖全产业链的职业教育集团。开展多元投资主体依法共建职业教育集团的改革试点。”^[20]从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产教融合政策是从当时社会背景出发,将产教融合与教师专业发展、职业教育的开放办学结合起来,进而实现产教融合政策深度发展。

四、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演变逻辑

(一)深层结构分析

职业教育的发展与政府、企业、学校各方有着密切联系,产教融合更是多方参与才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在对产教融合政策演变逻辑进行宏观分析时,应当从多方面考虑。

1.经济体制的影响。职业教育从诞生之初就被赋予促进经济增长、帮助国家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所以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发展一直与我国经济体制的变换息息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由于受到苏联的影响,我国的经济体制为计划经济体制,在该经济体制的要求下职业教育被建立,但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在人才培养规模、专业设置等方面都受到限制,办学自主权不足。随着党的十四大顺利召开,市场经济体制得到确立,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也随之发生改变。这一时期,政府开始认识到企业的重要性,在大力扶持企业发展的同时,十分重视企业对职业教育所起的作用,支持企业兴办职业教育,以促进产教融合的发展。近年来,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兴起使得职业教育的投资体制产生变化,政府给予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更多自主权。由此可见,我国经济体制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2.社会文化的影响。受到我国古代文化的影响,我国社会虽然有“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说法,但国人更加认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更加向往的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当今社会仍然存在通过学历高低来判断个人能力强弱、未来发展好坏的现象,所以人们大多都向往本科教育,职业教育从一出生便被带上“二流”的帽子。这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极为不利,所以在《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提出需要在全社会弘扬“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风气,其目的就是改变社会上的不良风气,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进而带动产教融合的发展。

3.科学技术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由于

国家发展的需要,我国向苏联学习科学技术,于是这一时期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人才培养目标就是重工业技术人才。之后由于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随之爆发,这段时期我国主要需求技术型人才。现在,以人工智能为首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到来,这无疑会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带来新的问题。由此可见,每当科学技术发展到新的阶段,都会对职业教育提出新的要求,为产教融合带来新的挑战,最终引起产教融合政策演变。

(二) 路径依赖分析

回顾有关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政策不难发现,产教融合的演变已经产生了十分严重的路径依赖,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1. 政府的理性选择。由于职业教育的特殊性及其我国曾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因此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发展一直采取宏观调控的方式。政府通过相关政策的调控完成对教育资源的分配,进而实现对产教融合的控制。第一,从现阶段产教融合发展现状及成果来看,政府现行产教融合政策已经产生了较为理想的效果,那么对政策执行者而言就没有必要承担风险进行较大程度的政策改动,只需根据已形成的政策框架进行适度调整即可。第二,国家为了发布的产教融合政策能被正常执行都会设置一些辅助性的配套政策,如“示范校”“优秀教师”“优质校”“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建设”等。这些政策、制度相互交叉,共同加强了政策的执行力度。由于建构这些制度的成本较高,废除这些政策代价很大,所以政策执行者更愿意保持不变,而这加剧了路径依赖的程度。

2. 职业院校的理性选择。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都处于政府的管控之下,高职院校如何招生、招生数额、教学方式及产教融合的方式都由政府进行规划。尽管当前国家已经出台政策来改变这种状况,但仍未起到很好的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由于长期处于国家领导的制度下,高职院校已经完全适应了该制度,知道如何在该制度下最大限度地争取自身利益。而如果进行改革,这无疑会使高职院校花费更多的物资、人力资源重新学习以适应新制度。第二,对于高职院校而言,国家政策的严格掌控未必是件坏事。国家的掌控意味着国家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育人成果负有责任,那么国家对于职业教育也必定给予充足的物资支持、政策福利等。如果国家将高职院校产教融合的办学主权彻底放开,也就意味着高职院校失去了已有的政策支持,那么这对高职院校来说并不是件好事。

(三) 动力机制分析

以历史制度主义为理论基础进行分析可知,政策演变不仅与宏观因素挂钩,也与微观行动者息息相关。基于此,政府和受教育者作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直接参

与者,对产教融合政策的演变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

1. 受政府获利途径改变的影响。将政府看作一个团体可发现,其本质也是趋利的。将政府作为一个利益相关者放入产教融合政策系统中研究,可以发现政府追求的利益就是通过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发展带动职业教育的发展,最终增加人民的利益。在职业教育创办初始阶段,政府对职业教育实行的管理制度是高度集权的,这时政府获利的途径就是政府政策直接对企业、学校进行调整,使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随着教育管理制度的改变,政府逐渐将产教融合发展主权下放,由直接控制变成间接控制、宏观调控。政府获得利益的途径变成了激励社会各主体积极与高质量的职业院校的合作办学。由此可以看出,当政府获利途径发生改变就会对产教融合政策产生影响。

2. 受教育者个人价值追求提升的影响。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发展对国家而言是为了培养有助于社会进步、国家建设的人才,对受教育者个人而言是为了提高能力,实现自身的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由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经济水平处于低迷的状态,这一时期人民的追求并不高,接受职业教育的目的只是学习一门谋生手段。但是伴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也愈加强烈,从开始的“有学上”发展为“上好学”,将教育理解为改变个人生活品质、实现个人价值的关键途径,教育对实现个体发展的功能愈加受到重视,于是这个时期的政策也更加关注产教融合育人质量的高低。2010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由此可见,受教育者个人价值追求的提升也会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发展产生影响。

五、结语

本文以历史制度主义为理论基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演变历程进行了深入分析。首先,根据历史制度主义的观点,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产教融合政策划分为萌芽、恢复、巩固发展、创新发展、深度发展这五个阶段。其次,从深层结构、路径依赖、动力机制三个层次对政策演变逻辑进行了分析。从宏观层面来看,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演变主要受经济体制、教育管理体制、社会文化、科学技术四个方面的影响;从中观层面审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演变主要受政府及职业院校两主体理性选择的影响;从微观层面考虑,政府获利途径改变、受教育者个人价值追求提升两方面对职业教育产教融

合政策的演变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EB/OL].(2019-01-24)[2022-05-02].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1904/t20190404_376701.html.
- [2] 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EB/OL].(2019-06-11)[2022-05-02].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moe_953/201906/t20190618_386287.html.
- [3] 古光甫,邹吉权.新中国70年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演变逻辑与发展理路[J].成人教育,2020(8):59-66.
- [4] 秦芬.产教深度融合的政策分析与推进策略[J].教育与职业,2020(15):13-20.
- [5] 李玉珠.产教融合制度及影响因素分析[J].职教论坛,2017(13):24-28.
- [6] 【党史声音日历】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EB/OL].(2021-12-23)[2022-05-02].http://news.cnr.cn/dj/20211223/t20211223_525695069.shtml.
- [7] 国务院关于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的指示[EB/OL].(1952-03-31)[2022-05-02].http://www.ce.cn/xwzx/gnsz/szyw/200705/29/t20070529_11524733.shtml.
- [8]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办学经验总结专号),1958(S1):1-5.
- [9] 国家劳动总局技工学校工作条例(试行)[EB/OL].(1979-02-20)[2022-05-02].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43883.
- [10]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EB/OL].(1985-09-27)[2022-05-02].http://www.ce.cn/xwzx/gnsz/szyw/200706/14/t20070614_11750610.shtml.

(上接第36页)

课堂、推优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推优上岗、毕业生思想鉴定等紧密联系起来,使志愿活动管理规范化。

概言之,青年志愿者行动是一项平凡而伟大的事业^[8-9]。本研究立足高校学生学习生活的基本需要、专业技能及社会需求开展志愿服务,探索了一系列易于坚持、操作简便的服务方式,其中以下四点经验可供借鉴:第一,建立志愿服务项目库和服务基地,整合志愿服务成果,发挥其正向价值作用;第二,借鉴本项目中的实地调研、问卷调查等方式,总结志愿服务存在的不足与误区,进而以此作为基础,探索志愿服务的发展方向;第三,将志愿服务成果作为学生评奖评优的重要参考指标,并设置志愿服务专项奖以肯定学生的个人价值,以维护志愿者参与活动的热情,同时巩固志愿服务的长效机制;第四,将志愿服务活动与“三全育人”理念有效结合,多方式、多渠道地致力于把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价值观培育融入学生成长的全过程,全方位、全过程、全员参与志愿服务育人实践,让学生在“助人”时实现“育己”。

总而言之,志愿者工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只有不断发现高校志愿服务存在的新问题,积极创新,不断积累和思考,探索高校志愿服务的有效、长效机制,才能充分发挥高校志愿者的积极性、主动

- [11] 劳动部关于技工学校深化改革的意见[EB/OL].(1989-05-10)[2022-05-02].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99097.
- [12]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关于加强普通高等专科教育工作的意见》的通知[EB/OL].(1991-01-06)[2022-05-02].<https://law.lawtime.cn/d522432527526.html>.
-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EB/OL].(1996-05-15)[2022-05-02].http://www.gov.cn/banshi/2005-05/25/content_928.htm.
- [14] 关于印发《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的通知[EB/OL].(2000-01-17)[2022-05-02].http://www.moe.gov.cn/s78/A08/tongzhi/201007/t20100729_124842.html.
- [15] 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EB/OL].(2002-08-24)[2022-05-02].http://www.moe.gov.cn/jyb_xxgk/gk_gbgg/moe_0/moe_8/moe_28/tnull_491.html.
- [16] 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EB/OL].(2005-11-10)[2022-05-02].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tnull_12730.html.
- [17] 关于印发《面向二十一世纪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原则意见》的通知[EB/OL].(1998-02-16)[2022-05-02].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moe_953/199802/t19980216_8944.html.
- [18] 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EB/OL].(2015-08-20)[2022-05-02].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moe_953/201508/t20150817_200583.html.
- [19]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EB/OL].(2010-05-05)[2022-05-02].<https://www.docin.com/p-96428880.html>.
- [20]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EB/OL].(2014-05-02)[2022-05-02].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1406/t20140622_170691.html.

性和创造性,促使更多大学生投身志愿服务的行列,推动高校实践育人工作开创活跃、务实的新局面^[10],从而为全国志愿服务工作的深入开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黎雨苗.浅析大学生志愿服务实践育人价值的实效性[J].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13,10(12):39-40.
- [2] 闪茜菁,戴卫义.论建立和完善高校青年志愿者活动的激励机制[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3(5):48-49.
- [3]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6-12-09(1).
- [4] 丁红莲,王志凝,刘志慧.建立高校青年志愿者工作长效机制的几点思考[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8(5):43-44.
- [5] 谈杰.国内大学生志愿服务研究述评[J].陕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4):8-10.
- [6] 戴卫义,闪茜菁.论建立和完善高校青年志愿者活动的激励机制[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5):28-29.
- [7] 蔡立彬.高校青年志愿者行动的德育机制、成效及发展对策探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5(8):63-65.
- [8] 韩艺飞,周游.高校志愿服务专业化、创新化与长效化发展机制研究[J].办公室业务,2021(18):98-99.
- [9] 马海波.实践育人视域下高校志愿服务全员参与机制探析[J].青少年学刊,2021(3):21-26.
- [10] 胡杰.新形势下高校志愿服务工作的现状及思考[J].现代商贸工业,2021,42(19):50-51.